
1931—1937 年间国民政府与朝鲜独立运动

徐 有 威

近代朝鲜人民争取独立复国的运动一贯得到中国人民的支持。国民政府对在华朝鲜独立运动的团体给予过许多指导和援助。民初，国民党人陈其美就在上海与朝鲜独立运动志士秘密成立“新亚同济社”，“专为谋朝鲜独立”，并予以资助。^①国民党其他重要人物宋教仁、胡汉民等也关注朝鲜独立运动。1921 年孙中山曾对辛亥革命期间就已参加同盟会的朝鲜独立运动领袖、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总理申奎植表示：对朝鲜独立运动“中国应有援助义务，自不待言”，“但由于国民党此时处境所限，一切实质性的援助须待北伐完成后方可能实现”。^②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特别是自“九一八”至“七七”这段时期内，国民政府援助朝鲜独立运动主要是通过国民党中央党部和三民主义力行社进行的。在蒋介石领导下，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果夫负责援助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韩国独立党），力行社书记滕杰负责援助朝鲜义烈团。^③

力行社与朝鲜义烈团

朝鲜独立运动志士同以黄埔军校毕业生为核心的三民主义力

① 秦孝仪主编：《陈英士先生纪念集》，台北，1977 年版，第 128—129 页；胡春惠：《陈果夫与韩国独立运动》，载台北韩国研究会编：《中韩关系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北，1983 年版，第 277 页。

② 阎石麟：《中韩外交史话》，东方出版公司 1942 年版，第 23、27 页。

③ 滕杰：《三民主义力行社援助韩国独立运动之经过》，台北百益印刷事业有限公司 1980 年 12 月 10 日，第 4 页。此文曾刊于台北《龙旗》杂志第 35 期。

行社的关系素来密切。许多朝鲜志士曾在黄埔军校接受过培训。后来成为朝鲜义烈团主要领袖的陈国斌(又名金若山或崔林)便是力行社书记滕杰在黄埔军校第四期的同学。1932年2月,三民主义力行社在南京秘密成立后,援助朝鲜独立运动便成为其主要活动之一。4月,力行社在内部设立“民族运动委员会”,经蒋介石核准,桂永清、于国勋、叶维等出任委员,于国勋为主任委员。其工作范围包括:以中国固有的“济弱扶倾”王道精神,优先援助中国周边的被压迫民族诸如朝鲜、台湾、越南、印度和缅甸等。此委员会下设有办事处,并享有固定的活动费用。^①

九一八事变后,朝鲜义烈团首领陈国斌即和黄埔军校同学黄绍美所组织的“亚洲文化协会”取得联系,随后面谒蒋介石,提出中朝合作反日倒“满”的秘密建议书。^②(一说陈国斌是通过滕杰见到蒋介石,向其陈明宗旨并请求援助的。)1932年5月蒋介石即批示“交力行社研究办理”。^③后来朝鲜义烈团即得到了力行社的直接援助。

当时朝鲜义烈团所制定的工作目标总体上可分为反日、倒“满”两大项,而实施细则又可分为五大类:一、对日本和伪满洲国要员进行暗杀;二、对东北反日团体进行提携支援;三、促使朝鲜和东北地区人民反日情绪的高涨;四、发行假伪币以扰乱伪满洲国的经济;五、从事其他情报特务工作。^④力行社的援朝活动便是以配合上述目标而展开的。

首先,力行社帮助培训朝鲜籍干部。1932年5月陈国斌向于国勋提出要办一个文武合一的革命训练班,需要国民政府对经费、

① 于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载于国勋等著:《蓝衣社、复兴社、力行社》,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20—121页;于国勋:《三民主义力行社与民族复兴运动》,台北,1986年版,第54—55页。

② 胡春惠:《韩国独立运动在中国》,台湾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编印,1976年版,第50页。

③ 于国勋:《三民主义力行社与民族复兴运动》,第55—56页。

④ 胡春惠:《韩国独立运动在中国》,第50页。

物资和训练场所提供支援。陈国斌的要求得到力行社书记滕杰首肯后,即获蒋介石批准。“朝鲜革命干部训练班”第一期于9月在南京力行社的训练基地汤山开学,首批朝鲜籍学员约有40人,6个月为一期。经陈国斌和于国勋商定,训练班课目大致分为军事、政治、情报、朝鲜史地、中朝关系史、世界史和兵工业务(简单制造弹药枪械)。于国勋除派员协助办理一些事务性工作外,还选派教员讲授情报、兵工和中朝关系史课程,其他教员则由陈国斌委派朝鲜籍人士担任。

从训练班的教学内容看,训育方面着重于生活管理、革命精神和革命人生观的培养;政治教育方面着重于朝鲜历史、思想理论和政治制度的学习;军事教育方面除一般军事知识外,着重于情报、爆破和突击性技能的演练。军事教育的目的为培养军事人才,以适应随时对敌作战的需要,这一类教学内容占全部教学课程的一半以上。朝鲜籍学员在训练期间绝对禁止使用朝鲜语,目的在于增进学员的中文水平,避免日后暴露真实身份,并利于毕业后乔装成中国居民潜入敌后从事抗日活动。^①

1933年第二期学员入学时人数有所增加。同年秋,该训练基地被日本特务发觉。于国勋旋与陈国斌商议将朝鲜干部训练班立即转移,并通知南京卫戍司令部警务处长韩文焕予以照顾。1934年夏,第三期学员人数增至百余人,于国勋在得到力行社本部及民族运动委员会同意后,前往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商请在军校中设一朝鲜籍学生特别班。军校教育长张治中慨然同意,并视陈国斌为其黄埔军校学生而善待之。不幸这年初冬此举又被日本特务侦知,特别班只好再度迁移。

1936年秋南京汤山训练班结束后,力行社在江西星子县设立的星子训练班(对外称“中央军校特训班”)继续训练朝鲜籍学员。

^① 范廷杰:《蒋委员长培养韩国革命军事干部——韩国革命在中国之八》,台北《传记文学》,第28卷第4期。

星子训练班前五期朝鲜籍学员仅数人而已,至第六期增至 100 余人,此训练班主要培养朝鲜籍学员从事敌后情报特工工作。^① 力行社在各地举办的各类专业训练班中,也有朝鲜籍学员。但是力行社有计划训练朝鲜反日复国独立运动志士的主要机构仍当属汤山训练班和星子训练班。^② 训练班所需武器由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八十七师师长兼首都卫戍司令王敬久和第二十五师师长兼津浦铁路警备司令关麟徵(二人皆为力行社社员)负责提供。^③

其次,力行社负责协同安排朝鲜籍学员的工作。1933 年 3 月南京汤山训练班首批朝鲜籍学员毕业后,被陈国斌派往上海、北平、天津、东北和朝鲜内地工作,其旅费除在在华朝鲜侨民略有资助外,一概由国民政府负担。1934 年春第二期学员毕业后,有二位毕业生即被派往日本,因为当时有许多朝鲜人在日本工作,他们极需和在中国的朝鲜独立运动组织取得联系。另外,在大连、葫芦岛和香港等地均有汤山训练班的毕业生潜伏工作。1933 年 1 月,陈国斌还曾随同于国勋前往平津一带活动,视察东北的中韩联合军。^④ 力行社曾计划在东北和内蒙古一带训练骑兵部队,并准备将陈国斌在汤山受训的学员一齐调去,“以图发展”。^⑤

全面抗战爆发后,力行社将星子训练班第六期朝鲜籍学员,编成为朝鲜义勇队,隶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义勇队队长为陈国斌。义勇队队员工作的分配仍由陈国斌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共商决定。朝鲜籍干部在抗战前线,配合军中政治部工作人员担任政治训练工作,或前往敌后收集情报或从事破坏工作,有时还担负招募朝鲜籍士兵的任务。

^① 邵毓麟:《韩国临时政府的独立奋斗与中国援韩——使韩回忆录之四》,台北《传记文学》,第 30 卷第 4 期。

^② 滕杰:《三民主义力行社援助韩国独立运动之经过》,第 6—9 页;于国勋:《三民主义力行社与民族复兴运动》,第 60—64 页。

^③ 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台北实践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21 页。

^④ 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 344 页。

^⑤ 于国勋:《三民主义力行社与民族复兴运动》,第 109 页。

朝鲜义勇队的活动受到中国各界的普遍称颂。滕杰曾追忆道：“他们英勇奋发之无畏精神，在选择工作时就表露无遗，令人非常敬佩”，“惟不问派往敌后也好，派往各战区也好，也不问所担任之工作性质如何，他们的工作都是很艰苦的。他们的待遇菲薄，任务很重，而处境又非常危险，但是一般说来他们所表现的工作成绩都非常良好，且其中还有很多可歌可泣英勇牺牲的事迹。”^①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也称赞道：“我所知道的有关韩国干部在本战区之努力不懈、负责尽责的工作情形，我觉得他们都已不愧为大韩民族的子孙，他们已为民族历史的延续、民族前途的光明而写下了成仁取义、尽忠尽孝的光荣史篇，这将是永垂不朽的。”^②

第三，力行社协助调解朝鲜独立运动各党派之间的关系，使其团结对敌。

由于种种原因，朝鲜独立运动在华各党派之间互不团结。滕杰从一开始便着手对以陈国斌为首的朝鲜义烈团进行劝解。陈果夫则注重对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金九派进行劝解。1933年夏，力行社民族运动委员会研究决定“应设法促使援韩独立运动统一”。力行社第六任书记长康泽认为，援朝工作须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力行社两方面协调一致后才能奏效，于是蒋介石便提议由方觉慧出面进行统一协调。方觉慧曾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卸职后创办《新东方》杂志，旨在遵循孙中山先生“济弱扶倾”的遗教，联合扶助近邻的东方各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自由。自创办此杂志后方觉慧便与这些民族的爱国志士往来，其中以朝鲜志士为最多。同时，身为国民党中央委员的方觉慧同陈果夫及力行社的许多成员关系密切，因此担任调解工作最合适。方觉慧曾拟将在华朝鲜各党派组成一联合统一的“韩国民族革命党”，但始终没有取得实效。^③

① 滕杰：《三民主义力行社援助韩国独立运动之经过》，第11页。

② 顾祝同：《韩国干部的特殊贡献和一般贡献·前言》，台北《龙旗》，1986年元月号。

③ 滕杰：《三民主义力行社援助韩国独立运动之经过》，第12—14页。

1938年6月,因形势变化力行社改组为三民主义青年团,它所担负的援朝任务乃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承接。但力行社在军队政训系统的人事安排并没有变化,出任军委会政治部办公厅主任的滕杰依旧与陈国斌保持联系。1944年陈国斌接受了滕杰“尽忍耐退让完成团结”的建议,终使朝鲜独立运动在华各党派大团结的目标得以实现。^①

此外,力行社的理论宣传媒介也曾大力称颂朝鲜独立运动的仁人志士。1932年4月朝鲜独立运动党成员尹奉吉在上海虹口公园刺杀日本军政要员数人后,力行社的主要刊物《前途》杂志曾发表以此事件为背景的独幕剧《复仇》,进行抗日宣传。^②力行社还多方拨款,直接资助陈国斌派的朝鲜独立运动人士。总之,抗战全面爆发前力行社的援朝工作取得了相当的实效。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与韩国临时政府

国民政府援助朝鲜独立运动的另一渠道,是通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系统进行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果夫因其叔父陈其美的关系,早年便与韩国独立党领袖有所联系。北伐后陈果夫奉蒋介石的命令,继续主持和朝鲜反日复国志士的联系工作。^③从九一八事变到抗战开始,陈果夫对金九为首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韩国独立党)活动的援助,取得了不少的成绩。

首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系统着力保护以金九为首的韩国临时政府成员和其他朝鲜志士的人身安全。1932年4月朝鲜独立运动党成员尹奉吉在上海虹口公园行刺日本要员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国务委员、警察厅长兼上海韩国侨民会会长金九旋宣布此举由他

① 滕杰:《三民主义力行社援助韩国独立运动之经过》,第15页。

② 上海《前途》,第1卷第2期,1933年2月出版。

③ 萧铮:《韩国光复运动之鳞爪》,台北《中央日报》1953年8月25日。

负责,由此成名并为国民政府关注。而日本当局大怒之下,在上海大肆逮捕可疑人员,即使是一般朝鲜侨民也在拘捕之列。据载,当时在虹口的日本临时监狱中关有千余人,而面对沪上中外人士的一片非难声,日本当局“置若罔闻”,依旧“我行我素”。^①此时,身居上海的金九处境极其危险。幸得美国传教士弗思博士(Dr. Firth)夫妇援手,金九在其家匿居达20余日。在此期间金九还让人起草《虹口公园炸弹案之真相》,并请弗思博士的夫人译成英文交上海诸报刊载。他严正声明:“余之武器为几杆手枪与几枚炸弹。余继续奋斗,并在余国未恢复前决不终止。”^②金九此举的确在朝鲜独立运动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朝野对韩人的态度,从此焕然一新,获得了极敦厚的同情”^③,中国社会各阶层对朝鲜独立志士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自不待言。^④不久日本侦得金九在上海藏匿处后立即“胁迫法驻沪领事与中国方面为难,欲得金九先生而心甘”。^⑤陈果夫得知此事后即令其部属萧铮赴浙江“处理保护金九行政管理各问题”。萧铮的同乡殷铸甫与浙江省前任省主席褚辅成相熟,于是介绍金九等前往浙江嘉兴褚辅成家暂住,褚辅成表示愿意负责一切。其媳妇朱氏还提议金九住到海盐更稳妥。为安全起见,萧铮还同浙江省保安处处长蒋伯诚密谈,请他注意保护金九。另据金九回忆:国民政府曾告诉金九,如他在上海危险的话,将派飞机去接他。但他认为:“他们请我去必是有什么要求的,我想我并没有什么可以给他们的,还是不要麻烦人家的国家好,所以我就谢绝了。”^⑥

金九对国民政府感激之余却心存顾忌,正表明此时他和国民

① 《十年来朝鲜的反日运动》,重庆青年书店1938年再版,作者不详,第30—31页。

② 上海《时报》,1932年5月10日。

③ 闵石麟:《中韩外交史话》,第101页。

④ 胡春惠:《蒋中正先生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之建立》,台北《近代中国》第55期,1986年10月出版。

⑤ 金恩惠:《韩国独立党三均制度之铨释》,南京1947年版,第67页。

⑥ 金九:《白凡逸志》,台北幼狮书店1970年版,第181页。

政府关系尚浅。但最终金九还是听从萧铮的周密安排离开上海，初进嘉兴，又入太湖，复藏于江苏各县，最后住进由萧铮主持的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地政学院内，直至抗战全面爆发才西迁四川大后方。^①金九等朝鲜独立运动领袖之能够逃脱日本当局的魔爪，以陈果夫为首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曾费心安排，这自然也同蒋介石的“特别细心照料”有关。^②1935年8月，上海曾发生朝鲜人金某行刺日本人案，金某被捕后供出南京有其“同党”五六人，南京黄龙山天宁寺内还设有干部学校等情报。陈果夫从何应钦处得悉后急忙致电萧铮，“请速转知调查有无其事为要”^③，同时陈果夫还设法保护其他朝鲜志士的安全，又一次避免了朝鲜方面的损失。

其次，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帮助金九派培养干部。虹口公园爆炸案发生后，金九等曾请求国民政府资助在南京设立一骑兵学校，用来训练朝鲜独立运动所急需的游击部队，但此建议未获蒋介石同意。^④1933年蒋介石在南京中央军官学校官邸约见金九时，金九表示：如果中国能提供100万元资金，他定能在两年内发动日本、朝鲜和东北等地的反日民众暴动。金九还提出了暗杀日本要员的计划书。蒋介石则认为，暗杀一个天皇还会产生另一个天皇，暗杀一个大将仍会有另一个大将出现；为朝鲜独立计，与其热心特务工作，还不如培养武官。此建议深获金九的赞同。^⑤

经蒋介石批准，中国开放各地军事院校接纳朝鲜籍青年入学。1933年12月国民党中央军官学校洛阳分校特设朝鲜军官班，接受金九等保送的92名朝鲜籍青年入学。由于朝鲜籍学员学历和语言所限，军校只得将他们编为普通班（又名速成班），实施为期两年

① 萧铮：《果夫先生对土地问题与协助韩国独立运动之远见》，台北《传记文学》第29卷第3期；萧铮：《中国协助韩国光复之回忆》（3），台北《传记文学》第45卷第3期。
② 胡春惠：《蒋中正先生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之建立》，台北《近代中国》第55期。
③ 萧铮：《中国协助韩国光复之回忆》（3），台北《传记文学》第45卷第3期。
④ 萧铮辑：《中国协助韩国光复运动史料》，编者印行，1965年版，第11页。
⑤ 金九：《白凡逸志》，台北幼狮书店1970年版，第250—251页。

的正规军事训练。^① 朝鲜籍学员的课目大致与中国学员相同,其中一般军事课程由中国教官担任,政治教育和精神教育则由朝鲜籍人士负责授课。韩国独立志士李青天和李范奭分别担任总领队和队长之职。直至1935年4月日本方面一再抗议,该训练班才不得不中止。国民政府中央军官学校及分校也曾接纳过朝鲜籍学员。朝鲜籍学员在中国各类院校中的学杂费、生活费、实习费和军人薪饷均由中方校方负担,毕业后或分配到中国部队服务,或赴东北一带从事抗日活动,均屡建功勋。^②

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曾设有一支政治工作队——韩侨战地工作队。韩侨战地工作队在江西铅山成立时只有二十几位热情的青年队员,然而不到一年功夫就已经发展到了103人,并从总部所在地扩展至附近各地。他们配合中国军队的政工人员到民间去侦探敌情,审讯俘虏,并做军民联系工作。这一以“策反”为中心的工作队直到日本战败投降后才宣告解散。^③ 朝鲜独立后,曾出任韩国空军总司令的金信将军(金九之次子)便是30年代国民政府所办的航空学校的毕业生。60年后他回忆当年在中国读书时均“享受免费待遇,直到读西南联大”。^④ 同样,曾任韩国海军总司令的孙元一将军也是在流亡中国时毕业于中国的商船学校,并由国民政府官费保送至德国深造。^⑤

由于以金九为首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收集日本军事情报工作中表现出色,1932年国民政府遂向他们提供情报人员的训练费用和全部活动经费,还向他们提供专用电台,这些都由国民党中央

^① 范廷杰:《蒋委员长培育韩国革命军事干部——韩国革命在中国之八》,台北《传记文学》第28卷第4期。

^② 林秋山:《蒋总统对韩国独立的贡献》,载《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26编,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854—855页;胡春惠:《韩国独立运动在中国》,第48页。

^③ 潘公昭:《今日的韩国》,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1947年版,第146页。

^④ 金信:《异国空军司令的中国情》,上海《上海滩》,1993年第8期。

^⑤ 邵毓麟:《韩国临时政府的独立奋斗与中国援韩——使韩回忆录之四》,台北《传记文学》,第30卷第4期。

组织部出面解决。^①由萧铮出面和当时主持中统局工作的徐恩曾商定,由中统局向金九提供专用电台和工作人员,并由这些工作人员负责帮助金九训练电信业务人员。金九对此多次表示感谢。^②金九的同乡兼世交的安恭根还曾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担任对敌情报工作,每月可获情报费用数千元。安恭根以此款项的一部分作为金九于1935年组建的韩国国民党党员的生活费;另一部分则作为特务工作费,直至1939年秋安恭根遇害后此项工作才告终止。

全面抗战爆发前夕,为了扩大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影响和实力,金九曾请求国民政府拨款购买飞机,自行组建航空队,并由曾在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接受过训练朝鲜籍学员驾驶赴日本和朝鲜工作。对此陈果夫、陈立夫给予多方鼓励,答应拨款相助。只是陈果夫认为朝鲜籍学员的训练至为重要,提出“惟人员宜早训练”的建议。^③

第三,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向以金九为首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提供了大量的财政资助。早在1927年金九开始组建韩人爱国团起,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果夫便资助其活动费5000美元。1932年4月起,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以民间团体名义每月资助金九派4000元,1934年4月起改为每月5000元。^④这还不包括上述各类型院校培养朝鲜籍学员的费用,情报工作所需要的费用均以中央组织部机密活动费名义按月拨给金九。陈果夫还曾致函萧铮,表示愿意资助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主办的《震坛报》每月三五百元,虽然当时中央组织部本身“经费极困,并且不易领取”,但陈果夫对金九

^① 萧铮:《韩国光复运动之鳞爪》,台北《中央日报》,1953年8月25日;邵毓麟:《韩国临时政府的独立奋斗与中国援韩——使韩回忆录之四》,台北《传记文学》,第30卷第4期。

^② 萧铮:《中国协助韩国光复之回忆》(3),台北《传记文学》,第45卷第3期。

^③ 萧铮:《中国协助韩国光复之回忆》(3),台北《传记文学》,第45卷第3期。

^④ 林秋山:《蒋总统对韩国独立的贡献》,载《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26编第852、856页。

的工作却不吝支持。^①

1933年2月起,陈果夫还以特别费名义每月通过萧铮转送金九。有时陈果夫的款项无着,便由萧铮暂垫,然后陈果夫再补发。1934年此笔经费改归国民党中央党部特别费预算内支付,金九的领款收据均缴交国民党中央保存。萧铮曾让金九专门刻一印章,无论何人凡持此印鉴领款条者,萧铮见条后一律照发不误。陈果夫对此项工作颇为关心,时加询问。^②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领袖们对此的感激之情从金九之次子金信的言辞中可以窥得:“因为大韩民国抗日运动的主要基地,不但是在中国大陆蒋介石总统的庇护与协助下创立并活动,而且蒋总统对于大韩独立运动比起世界上的任何人对我们更为确实的了解,并且不惜予以各种支援,特别是先亲得到了最多的恩德与帮助。”^③

在援朝活动中力行社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还进行过合作。1932年7月15日蒋介石曾电令滕杰“迅派三人至贡沛诚处服务,并须接受其指挥为要”。贡系萧铮的助手,属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系统。滕杰旋遵命选派三名青年军官去贡沛诚处“听候驱使”。嗣后此三人由金九派遣去东北从事地下工作。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在对日问题上虽然时时妥协、退让,但为实现抗日的根本方针,仍始终坚持秘密援朝,直到卢沟桥一声炮响,中朝两国才公开携手进行抗日斗争。

(作者单位:中国纺织大学社会科学系)

① 萧铮:《中国协助韩国光复之回忆》(3),台北《传记文学》,第45卷第3期。

② 萧铮:《中国协助韩国光复之回忆》(3),台北《传记文学》第45卷第3期。

③ 金信:《韩国人心目中的蒋介石总统——在第八届“韩中学术会议”的致词》,台北《近代中国》第55期,1986年10月出版。